

英文版总主编

WILLIAM DAMON RICHARD M. LERNER

中文版总主持

林崇德 李其维 董 奇

儿童心理学手册

(第六版)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IXTH EDITION)

第三卷(上)

社会、情绪与人格发展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英文版本卷主编

NANCY EISENBER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儿童心理学手册

(第六版)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IXTH EDI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6th Edition
By William Damon, Richard M. Lerner, and Nancy Eisenberg

Copyright © 2006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John Wiley & Sons International Rights, Inc. 授权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380 号

《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中文版序

写序难,为这约 800 万字的皇皇巨著写序似乎更难。

先说说这套中文版手册的成书由来。

把最新版本(2006 年第六版)的《儿童心理学手册》介绍给中国的学界同仁,其最初想法在该年的年底就已萌发。当时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和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在广州联合举行学术年会,我们三人均有幸受邀,忝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报告人。尽管我们没有在各自的报告中过多谈及这一问世不久的新版《儿童心理学手册》,但在会下和会后的交谈和联系中,我们已考虑组织队伍迅速将之译成中文的可能性。巧合的是,其后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与心理编辑室主任彭呈军同志主动就翻译出版手册之中文版一事征询我们的意见。彭呈军同志本人亦是发展心理学的专家,接受过该领域的专业训练。他深知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我们并且被告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杰人教授秉承其一贯对出版高品位心理学著作的热心态度,明确表示只要经过认真而严肃的论证,一定会全力支持并尽快落实这一出版规划,并且提议由我们三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态度,使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使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于是,在 2007 年初这一颇受中国发展心理学界同仁注目的工作正式启动。

从 2007 年初至 2009 年初,历时两个寒暑,计约 800 万字的《儿童心理学手册》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作为中文版的主持人,我们顿有如释重负之感,同时也颇觉兴奋和欣慰。或许,我们在不经意间竟创造了历史。因为翻译和出版手册类图书,这在中国心理学界未有前例,且其间动员、组织了国内几乎整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界的力量共襄此举,这更是值得铭记之事。

对任一学科而言,手册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任何学术手册的语种嬗替,其困难之处也许不在于专业内容的理解、把握和准确表达,更在于其时效性的潜在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出版的全套作业,这多少有些冒险。须知,倘费时耗日,当我们勉力成书之际,人家又有新版问世,这岂非让我等劳作成了“明日黄花”!因此,手册价值的第一要义在于其时效性,这也是我们始终未敢懈怠的首要考虑。基于此,我们在受命之初,就确定了动员全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同仁协力同心,共同参与,在确保译文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

快地推进翻译和出版进程之原则。我们之所以敢于接受这一任务,坦率言之,首先,乃是基于对目前中国儿童(发展)心理学界基本队伍的了解和信任。历经改革开放数十年,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展开,中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学术水平迅速提高。国内许多同行的研究也与时俱进,已具备在许多相关领域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的话语权。当然,差距犹存,但已获之成果足令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儿童心理学手册》原版的主编自认为其各章的撰稿人都是发展(儿童)心理学各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同样我们也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中文版的译校队伍亦为国内相关领域的一时之选。任何学术著作的翻译,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一种学术对话,对话的质量就直接反映在译文的水平上。总体而言,我们对译文的质量是满意的。其次,如下条件也为我们预期可完成这项工程平添了信心:中国发展(儿童)心理学界不仅学科队伍齐整,而且具有团结协作的良好传统。改革开放早期,朱智贤、刘范、朱曼殊、李伯黍诸先生就曾经领衔组织过全国范围的合作研究项目。我们理应追随前辈,使这一传统后承有绪。去年开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的由我们主持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就是另一全国协作的大项目。而此次《儿童心理学手册》中文版的问世当为中国发展(儿童)心理学界的成功合作更添新的标志!作为这一工程的主持人,我们深感于国内同仁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投入!这使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联系并确定各章的译校者,所邀同仁,无一例外地慨然应允,而且几乎全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没有他们的努力,要将这四卷(中文版分8册)中文版《儿童心理学手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奉献于读者面前,那是极难想象的!在此,我们谨向参与这一工程的所有同仁表达我们真诚的谢意!

下面我们对这一新版《儿童心理学手册》本身之某些可议之处再稍作赘语。这或许对开卷阅读此书的读者有所裨益。

原手册主编之一 W. Damon 教授为手册撰写了长篇前言(1998 年第五版的前言也为其所撰),对手册长达 75 年的演变历史作了详尽的阐述,对从 C. Murchison 以后,历经 L. Carmichael、P. Mussen,再到他们自己(W. Damon 和 R. M. Lerner)的各版手册之内容特色和主题变迁,所论周详,为我们描绘了发展(儿童)心理学自身发展的历史长卷。某种意义上,Damon 的前言本身不啻为关于发展(儿童)心理学之发展的一项元研究。如他所说,手册扮演着这一学科之“指向标、组织者和百科全书的角色”。我们建议读者,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或旁专业的,抑或是发展(儿童)心理学中某一分支领域更为专门的研究者,在从手册采撷你所感兴趣的材料之前,这一前言是应该首先阅读的。

由于 Damon 出色的前言在前,这给我们撰写中文版序言增加了压力。若提出更高要求:企望在深入各章内容之后,再行跳出,站在高处对它们作一评述的话(严格来说,还必须对前几版相关内容的演变作纵向的回顾和比较),这更为我们力所不逮,且多少有点令我们产生某种“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

作为一名发展(儿童)心理学家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我们始终有薪火相传、不断更新的《儿童心理学手册》相伴随。其他领域的心理学家就未必有此好运。诚如 Damon 所言,“《儿童心理学手册》对本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之大甚至连那些世

界著名的学术手册也难以比拟”(见本手册“前言”)。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当年 Murchison 的首创以及随后 Carmichael 和 Mussen 的开拓进取以及当代 Damon 和 Lerner 的继承发扬,一句话,若没有这一系列的《手册》问世,当今发展(儿童)心理学的园地也许不会有今日如此繁荣的景象! Eisenberg 曾将 1970 年版《手册》(Mussen 主编)奉为“圣经”,这或许是她作为 Mussen 弟子的溢美之词,但要说历代发展(儿童)心理学家未曾受惠于这些《手册》,这就难免有罔顾事实之嫌了!试问,当代发展(儿童)心理学的各类研究课题、数以百千计的学术著作和学位论文,哪一项或哪一篇敢于声称没有受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启示和指导?学术的滋养也许润泽于无声,但它的影响是难以否认的。它实际起到了指引新研究方向之“明灯”、形成新思想之“发生器”、提供新知识之“宝库”和孕育新理论之“摇篮”的作用(Damon 语)。

历代各版《手册》的宗旨始终为历任主编所恪守,即旨在为我们“提供一幅对知识的目前状态进行全面、准确描绘的图画——主要的系统性思考和研究——在人类发展的心理学领域内最重要的研究”(Mussen, 1983 年版“前言”),以“真实地向读者奉献一部完整的儿童心理学”。传统上,《手册》的读者定位于所谓“特定的学者”,因此具有“高级教程”的特点。但自第五版之后,其“特定学者”的范围显然有明显扩大的倾向,因为“如今的学者更多倾向于在多学科的领域,如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和精神病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的遨游”(Damon, 本版“前言”),而且这种遨游必定还伴有不同研究导向的实践工作者与之同行。

《儿童心理学手册》从“四分卷”之体例到各卷内容的主题确定,乃是从 1998 年的第五版开始成型的。第五版与 1983 年的第四版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正是从第五版始,几种如今几乎成为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们工作语言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取向渐居主流地位。它们是动力系统论、毕生发展和生活过程论、认知科学和神经模型、行为遗传学方法、个体—情境交互论、动作论、文化心理学以及泛新皮亚杰学派和泛新维果茨基模式。就这些主题而言,第六版与第五版相比,似乎更多地只是表现为新材料的增加、思考层次的深入而并无方向上的重大转变。如果说从第四版到第五版是“革命”的话,那么从第五版到第六版,确切地说,应该只是某种“改良”——尽管某些方面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或许也未必会再产生更多新的范式。因此,我们应对 Damon 和 Lerner 对手册的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至于本版(第六版)与第五版的不同之处,Damon 和 Lerner 在其所撰第六版的“前言”中未作详列,当然读者完全可以自行判断。我们仅略述如次。

在第一卷“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中,本版保留了 1998 年第五版 19 章中的 15 章,其撰稿人也没有变化。除删去第五版中的第 6、7、8 和 13 章外,较大的变化是增加了 3 章新的内容,即“现象学生态系统理论:多元群体的发展”、“积极的青年发展:理论、研究与应用”和“宗教信仰与精神信仰的毕生发展”。这一变化显然与后面我们还将提及的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中“系统发展理论”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现状相一致。

相对而言,第二卷“认知、知觉和语言”在体例和结构上均有所变化:第五版的 19 章先被

重新组织为以阐述认知发展的神经基础以及婴儿期的知觉和动作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基础”部分以及“认知与交流”、“认知过程”、“概念理解和成就”和“展望儿童期后的发展”这四个部分,然后将相关各章分属于它们,所涉主题也略有扩大而增至 22 章。至于撰稿人,22 章中有 15 章由新人担纲。

第三卷“社会、情绪和人格发展”的体例和撰稿人变动最小。两版均为 16 章,其中题目和撰稿人均未变化的就有 12 章;第 2 章、第 3 章和第 15 章只是题目分别从“早期社会人格的发展”改为“个人发展:社会理解、关系、道德感、自我”;从“生物学与儿童”改为“生物学、文化与气质偏好”;从“成功动机”改为“成就动机的发展”,但 3 章的撰稿者仍是原班人马。唯一一章题目和撰稿人均有变化的是第 16 章“人际环境中的青少年发展”(第五版的题目为“家庭背景下的青春期发展”)。

第三卷尽管体例和章目改变不大,但内容的重点却有新的侧重。如该卷主编 Eisenberg 所指出的,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对“变化过程”的重视上,即研究者普遍进行着各种“中介作用”的考察。此外,大量的调节变量也成为研究者的关注中心,对调节过程的研究和讨论更加深入,给予儿童情绪及情绪驱动的行为调节机制以及调节过程的个体差异与个体社会能力和适应的关系予以更多注意。可以说,有关自我调节的内容几乎在这一卷的各章中都有不同形式的讨论。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分卷的主编, N. Eisenberg 也许是最为恪尽职责的,因为只有她为这一卷撰写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导言”。这无疑为读者对全卷各章内容的全方位的思考提供了便利。

第四卷“应用儿童心理学”在体例、撰稿人及各章安排上均有较大变化。这反映了实践的需求以及儿童(发展)心理学自身对应用基础的日益重视。该卷的主编(两版同为 Renninger 和 Sigel)一如第五版的旧例,亦为本卷撰写了简短的前言(只是调换了两署名的顺序)。但他们把第五版的“家庭养育”、“学校教育”、“心身健康”和“社区与文化”这四部分所涉内容重新组织成为“教育实践中的研究进展与应用”、“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与含义”和“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的研究进展及其意义”这三个方向,同时在撰稿人和各章主题上均有较大改变。内容涵盖面有所扩大,从 17 章扩至 24 章,作者多数更换为新人。除该卷主编 Renninger 和 Sigel 外,只有“发展心理病理学及预防性干预”、“人类发展的文化路径”、“儿童期贫困、反贫困政策及其实行”、“父母之外的儿童保育:情境、观念、相关方及其结果”这四章的撰稿人身份予以保留。

在罗列了上述关于第五版与第六版的异同之后,我们还想略费篇幅对这两版手册的最可关注之处表达我们的浅见。我们认为,近些年来,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进展突出体现在“理论”和“应用”这两个方面。

Lerner 为本手册第一卷撰写的第 1 章“发展科学、发展系统和当代的人类发展理论”具有全手册导论的性质。它理应成为阅读全书的理论向导。

根据 Lerner,当代人类发展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变化是系统论思想的产生、发展并渐成主导思潮,它是我们构筑真正跨学科的儿童(发展)心理发展的研究领域的必然产物。发展系统思想正成为过去十年儿童(发展)心理学中理论变化的核心。它的跨学科的内在属性甚至

使越来越多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不满原有的称谓,主张以“发展科学”来取代“发展心理学”。发展系统论的界定性特征可概括为关系实在论、历史(时间)根植性、相对可塑性和发展多样性这四个主要方面(Lerner 虽列举了更多特征,但都可在上述四个方面中得到释述)。Lerner 认为,发展系统理论的框架在发展科学研究中已处于“支配地位”,它甚至被提到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高度。

以下我们就发展系统理论的这四个方面稍作说明。

从哲学层面而言,发展系统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关系实在论。关系实在论摒弃一切传统的两分概念[在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它们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熟与学习”、“天然与教养”、“连续与间断”、“稳定与不稳定”、“完全不变与变化”等成对范畴]。关系实在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二元对立的,而是构成一种整合的相互依赖和彼此决定的关系。它主张应融合整个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的不同组织水平(从生物学到文化学),强调这些不同水平之间的关系才是构成发展分析的基本分析单元。这一思想几乎指导着本手册各章的内容,由此产生了许多更为具体的不同的理论模型,其涵盖领域既有传统领域(如知觉和动作发展、个性、情感和社会性发展、文化与发展、认知发展等),也包括新出现的研究领域(如精神和信仰发展、多样化儿童的发展、人类的积极发展等)。

关系实在论对流行已久的“普遍性规律”的概念造成巨大冲击。传统研究者拘泥于实质源自实证主义和还原论的万物一统观,即人类行为的研究旨在确认通常与人有关的所谓普遍性规律。关系实在论则强调个别化的特异性规律。每个个体都是其自身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对个体—情境关系的强调,使“发展科学从一个似乎将时间和地点视为与科学发展规律的存在和作用无关的研究领域,转化为一个试图探求情境根植性和历时性在塑造多样化个体和群体发展轨迹中的作用的研究领域。”(本手册第一卷第1章)

发展的可塑性是发展系统理论的另一要点。“可塑性”又与“发展的多样性”的概念相通。因为在个体与情境构成的动态系统中,个体与情境本质上是相互塑造的。于是在人与情境之间建立起“健康的支持性的联合”就可促进所有多样性个体的积极变化。而且,与发展科学对可塑性与动态性的理论关注相适应,纵向研究方法中用以评估发展系统中个人与情境间关系变化的统计方法的新进展以及关于质性分析技术的融合使用,也为之提供了方法的支持。

可塑性不能脱离发展的历史(时间)根植性。系统随时间进程而变化,即所谓历史(时间)根植性。发展系统论主张的历史(时间)根植性认为存在贯穿毕生持续系统的变化。多组织水平的联合作用既促进系统的变化,也制约着变化本身。

具体到个体,没有一个人的个体 $\longleftrightarrow$ 情境的关系是相同的;即便同卵双生子,他们也有着不同的关系史。“这种生物与情境随时间而出现的整合,意味着每个人均有各自发展的轨迹,它是个人所特有的。”多样性既指个体内的变化,也指个体间的差异。发展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命历程所特有的特征,且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财富,因为它界定了人类生命最优化之潜在物质基础的变异范围。它使人们利用它以实现自身积极、健康的毕生发展成为可能。

发展系统的相对可塑性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发展的潜势,当这种潜势与环境发展资源整合之际,积极的发展变化就可期待。“为一个人一生的相对可塑性提供可能性的个体 $\leftrightarrow$ 情境的关系融合系统,构成了每个人的某种基本发展势力。”这种势力是发展的真正动力之源。

系统的发展方向不一定是正面的,关键在于社会的资源提供是否及时。发展科学的最大应用价值是努力使发展最优化,即促进在主体的实际生态环境中,最好地联合内外资源去塑造他的生活历程。这就要求我们发展科学的研究者能为之设计和提供一种“能描述、解释和优化实践(使发展最优化)为一体的科学议程”。对多样化群体中个体和群体的认识,对多样化情境资源的认识以及整合的科学议程都是发展科学所必须的成分。

从发展的可塑性、时间根植性和个体—情境的动态系统观出发,就应对“个别差异(缺陷)”这一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最为熟知的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传统上,个别差异是从误差变异的角度来理解的,或是被理解为是由实验控制缺乏或测量不当所致,或是(更糟糕)干脆把它们理解为是某种缺陷或异常的指标。

遗憾的是,这种“缺陷”取向的思考方式的残余至今仍游弋于发展科学的外围,特别在行为遗传学、社会生物学或某些进化心理学之中。众多学者已警告我们:这些关于基因和人类发展的错误观念,普通人或许易受其迷惑,但决不能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缺陷取向的理论基础,归根结底是遗传还原论和环境还原论。它们对公共决策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其与缺陷模型相结合的时候。因为尽管个别差异是绝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人属于缺陷人群,有人属于优势人群”。

假如要为遗传与环境以及其他众多二元对立的概念之纠缠不清的争论解套,要肃清堂而皇之存在的两分法思维的残余影响,那就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交互作用”概念。交互作用只是“用自身通常被概念化的两个分离的单纯实体……以合作或竞争的或独立地(在)起作用”来描述事物(Collins et al., 2000)^①。只要是立足于这样的交互作用,争论两者(如天然与教养、机体与环境)的相对贡献大小,便是毫无意义的。一言以蔽之,所有两分法的观点,特别是遗传还原论的观点,不能作为阐述人类发展的理论框架。这在神经科学大举进入心理学家视野之际,尤应警惕。

从轻易地对差异贴上“缺陷”的标签,到将之理解为“发展的多样性”,Lerner认为这堪称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对人类本质特征的认识,以及对时间、地点(情境)和个体多样性的认识的范式转变。这一转换在第五版 Damon 和 Lerner 两主编当年曾亲自担任主编的“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一卷中即已成形,并开启了它们在发展科学中渐趋活跃的时代。至于在第六版中,则它与处处可见的发展系统模型有关。结合两版各章(包括第六版的新章),可得出如下结论:发展是动态的、多样的;时间和地点(情境)的差异是本质而非误差。因此,“要认识人类发展,必须认识与个体、地点(情境)和时间有关的种种变量是如何协

^① Collins, W. A., Maccoby, E. E., Sternberg, L., Hetherington, E. M., Bornstein, M. H. (2000).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parenting: The case of nature and nurtu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218-232.

同塑造行为的结构和功能及其系统的和系列的变化”(参阅第一卷第4、8、11、13、14、15、16等各章以及 Elder、Modell 和 Magnusson 等人的研究)。

当然,发展的多样性并不否认存在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只不过它同时坚持也存在“个别化的规律”,而且认为前者的概括需要经过经验的确证,而非先验的约定产物。个别化的、特异的和普遍性的规律共存;每个人和每一人群均有其独特的和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应成为发展分析的核心目标。发展系统理论也并不否定基因等的作用,而是强调“基因细胞、组织、器官、整个机体以及其他所有构成人类发展生态环境的机体外组织水平,融合为一个完全是联合起作用的、相互影响、因而是动态的系统”(Lerner, 本手册,第一卷,第1章)。动态系统的核心特征是不把系统内的变量理解为独立的因素,它所指的“相互作用”是相互决定并彼此塑造的双向关系。说“动态(力)系统”是手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似不为过。关于发展系统取向的经典的研究,有兴趣并希望用于实证研究的读者可进一步参阅本手册有关各章及更多的相关著作。我们认为,尽管这些方法目前并未普及,但预示着未来的方向。

再说说本版《手册》在重视儿童(发展)心理学应用方面的特色。

尽管 Kurt Lewin 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常被人引用,但理论毕竟不能代替实践。把儿童发展研究与实践的主张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发展科学的应用取向已受当代发展学者的普遍重视。它既是发展系统理论所强调的可塑性、时间根植性和发展多样性的自然归属,同时也向我们呈现了发展科学的跨学科性质的时代风貌。这在本版《手册》中有充分展现。

值得指出的是,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对应用的重视,并未使发展科学沦为纯实用的技术,而是将之提升到了“应用的基础研究”的层面。

自1996年由 Stokes 提出“应用的基础研究”概念之后,基础研究与应用不再被视为界限分明的两个方面,而成为“沟通基础研究与活生生的人和活动之间的管道”。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不再只关心认知与情意功能的某些割裂的方面,而是去拓展“教育或临床干预以及课本、软件、课程及媒介如何设计”等实践的专业性功能,这完全符合“任何研究须以满足社会需要”之根本要旨。“应用的基础研究”不仅要整合儿童(发展)心理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因为它“并非只借鉴单一的理论或研究传统”;而且由于“实践的发展研究(是)建基在具体解析环境问题、关注环境一般性质及有明确实践原理的研究之上”,因而它实际还要借助于与心理学的其他领域的合作,如临床、认知、教育、神经及社会心理学。因此,应用的基础研究要求跨学科领域的合作。这提示我们,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应该具备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素养。我们也许可从这最新一版的《儿童心理学手册》的第四卷中感受到这一变化,并从国外同行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中获得某种启示。当然应该指出,有关应用和实践的基础研究,这是最与社会、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连的。中国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理应开创自己更符合中国国情、社情和民情的应用课题。它们在任何国外的现有研究所不可取代的,也是我们可以贡献于整个人类发展科学的大可用武之处。

最后我们想说,我们稍感遗憾的是,基于《手册》使用的时效性,我们原计划此书能在

2008 年内即与读者见面的,但现在的出版时间稍稍晚于我们的预期。一项大工程,其间涉及一些难控的因素似在所难免。不过如以第五版与第六版之时隔 8 年为参照,它将至少还有 5 年的有效期。应该指出,一定意义上,凡手册所载之知识,乃是前人已知且相对凝固的知识;而学术之树常青。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中汲取营养,孕育和构建新知。“读书仅向大脑提供知识原料,只有思考才能把所学的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洛克:《人类理解论》)。中国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未来一定会以更多创造性的成果反哺于下一版的手册!我们期待着。

林崇德 李其维 董奇

2009 年 1 月

《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前言

WILLIAM DAMON

所有学术性的手册在其学科领域中均发挥诸多重要的作用,首要的是,它们反映了该领域最近发生的变化以及使这些变化得以产生的经典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手册都反映了其编撰者在手册出版之际,他们对自己领域内最重要内容的最佳判断。但许多手册也会影响到这些领域本身的发展。学者们——尤其是年轻学者们——会把手册作为信息来源,从中得到启示,进而指导自己的研究。举凡一种手册,它在对自身领域之构成加以考察之际,同时也汇集了日后将会决定该领域之未来发展的各种思想。因此,手册不仅是一盏指明灯和一种发生器,以及大家共同接受之知识的宝库,同时也是孕育新洞见的摇篮。

本手册继承的传统

在有关人类发展的研究领域,《儿童心理学手册》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之大甚至连那些世界著名的学术手册也难以比拟。《儿童心理学手册》一直在为该领域几乎长达75年的发展研究继承着扮演指向标、组织者、百科全书角色的传统,这段时间可以说涵盖了发展领域绝大部分的科学工作。

Carl Murchison 于 1931 年协调整合了各方面的稿件,推出了第一本《儿童心理学手册》。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工作,这一领域如今会是什么模样。无论 Murchison 本人是否认识到了这本手册的潜在价值(本身是一种有趣的思考,假定他的梦想和雄心出于自然),他开始了出版这一工程的首创工作。它不仅费时旷日,而且发展成为一种跨越许多相关领域的繁荣传统。

通观《手册》的成书历史,它收集了世界范围内有关发展的研究,并在这些研究中起到了形成的作用。我们作为发展学家,目前状况如何,我们已知道了什么以及我们将向何方向发展,对这些问题,本手册的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呢?至于在我们所探索的问题中,在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中以及在我们为求得对人类发展的理解所引用的理论观点中,什么发生了改变,什么保持原样,手册的历史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借助提出这些问题,我们遵循着科学本身的精神,因为发展的问题可以在任何努力的水平上提出来——包括建立研究人类发展的宏大事业。为了达于对该领域所描绘的人类发展的最好理解,我们必须了解该领域本身是怎

样发展的。对一个要考察其连续性和变化的领域来说,我们必须探问:对该领域本身而言,什么是其连续性,什么又是其变化?

对《手册》历史的回顾绝不是去讲述该领域为什么表现为今日现状的完整故事,而只是展现这个故事的一个基本部分。它指明那些决定了领域发展方向的选择并且它影响了这些选择的作出。基于此,本手册的历史揭示了关于这一门学科形成的大量判断和其他的人类因素。

本手册的特点

Carl Murchison 是一位主编过《心理学文档》(*The Psychological Register*),创办并主编过多种核心心理学期刊,撰写过社会心理学、政治、犯罪心理等书籍,编辑过各种手册、心理学教科书、著名心理学家传记,甚至一本论述精神信仰的书籍(Arthur Conan Doyle 爵士与 Harry Houdini 也在此书投稿人之列)的学者/指挥者。Murchison 主编的最初版《儿童心理学手册》由一家小型的大学出版社(Clark 大学)于 1931 年出版,当时该领域本身尚处于其婴儿期。Murchison 写道:

实验心理学一直具有(比儿童心理学)更悠久的科学和学术地位,但目前的经费投入,纯粹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投入也许要比儿童心理学领域少得多。尽管这已是明显的事实,但很多实验心理学家仍然轻视儿童心理学领域,他们认为它的研究特别适合于女性以及那些不怎么阳刚(masculinity)的男性。这种所谓保护的态度乃是基于完全忽视儿童行为领域的研究需要巨大的阳刚气概。(Murchison, 1931, p. ix)

Murchison 阳刚的隐喻当然是产生于他那一时代;它对某种性别刻板印象的社会历史是一种很好的修饰。Murchison 对其所要肩负的任务及采纳的方法有先见之明。在 Murchison 为其手册撰写前言之际,发展心理学只被欧洲和少数具有前瞻眼光的美国实验室、大学所了解。然而, Murchison 预见到该领域即将会得到提升:“如果目前尚不能达到,但当几乎所有有智慧的心理学家都意识到:大半心理学领域涉及一个问题,即婴儿在心理上如何变为成人时,这个时刻就不会太过遥远。”(Murchison, 1931, p. x)

为撰写 1931 年初版《手册》, Murchison 走访了欧洲及美国许多儿童研究中心(或“工作站”)(Iowa、Minnesota、UC. Berkeley、Columbia、Stanford、Yale、Clark)。Murchison 的欧洲伙伴包括年轻的“发生认识论”学家 Jean Piaget, Piaget 在其撰写的“儿童哲学”(Children's Philosophies)一章中,大量引用了他对 60 名 4 至 12 岁的日内瓦儿童所作的访谈。Piaget 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他对儿童最初的世界概念进行研究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程序。另一位欧洲学者 Charlotte Bühler 撰写了关于儿童的社会行为一章。有关这一主题至今仍是新鲜的, Bühler 描述了蹒跚学步儿童复杂的玩耍行为及交流模式,这一内容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被发展心理学家重新探究。Bühler 同时也预期对 Piaget 的批判将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语言学的鼎盛时期:

Piaget 在其关于儿童谈话与推理的研究中,着重强调儿童的谈话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不具有社会性……3 到 7 岁的儿童伴随操作的谈话,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相互交流,而像是一种独白……[但是]儿童与家庭每个不同成员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是会在分别进行的交谈中有所区别地反映出来。(Bühler,1931,p. 138)

其他的欧洲学者包括:Anna Freud 撰写了“儿童的心理分析”一章,以及 Kurt Lewin 撰写的“儿童行为和环境的作用”一章。

Murchison 选择的美国学者均非常有名。Arnold Gesell 开展对双生子研究,他提出的先天论解释,至今我们仍耳熟能详。斯坦福的 Louis Terman 对“天才儿童”概念作出全面的诠释。Harold Jones 论述了出生顺序的发展效应。Mary Cover Jones 介绍了关于儿童的情绪研究。Florence Goodenough 所写一章是关于儿童绘画的内容。Dorothea McCarthy 撰写了有关“语言发展”的一章。Vernon Jones 在“儿童道德”的一章中强调其个性发展的方面,但这种说法在认知发展变革期间曾淡出人们的视野,不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又被视为道德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又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

Murchison 的儿童心理学的思想也包含对文化差异的考查。他的《手册》向学术界推出了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她刚刚结束在 Samoa 和 New Guinea 的周游。在 Mead 的早期著作中,她曾写到:她的南海(South Seas)之行是想对早期“结构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质疑,如 Piaget、Levy-Bruhl 等人所提出年幼儿童思维的“泛灵论”观点。(有趣的是,同一卷中 Piaget 所写一章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就是讲述日内瓦的儿童是如何随年龄增长而摆脱泛灵论的。)Mead 报告了一些她认为“令人惊异”的数据:“在 32 000 幅(年幼“思维幼稚的”儿童所作)的图画中,不存在将动物、物质现象或无生命物体拟人化的案例。”(Mead,1931,p. 400)Mead 同时也用这些数据批评西方心理学家的自我中心主义观点,她指出泛灵主义和其他观念更可能是文化因素导致的,而非早期认知发展的本质。这些内容对于当代心理学并非是陌生的主题。Mead 还向发展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在不熟悉文化中进行研究的研究指南,并附以研究方法及实行这些方法的建议,如把问题翻译为当地语言形式;不要做控制实验;不要对处于懵懂年龄(knowing age)的被试进行研究(他们往往是处于对研究的无知状态);与你所研究的儿童有更多的接触等。

尽管在 1931 年《儿童心理学手册》中,Murchison 邀请了阵容庞大的作者队伍,但他的成就感并没有使自己满足很久。仅仅 2 年后,Murchison 就推出了第二版,在这一版中他写道:“在短短的 2 年多时间之后,这第一次修订就几乎不包含与原版《儿童心理学手册》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 3 年里,该领域的研究迅速扩展,部分原因也在于编者的观点发生了变化。”(Murchison,1933,p. ii)由 Murchison 所带来的传统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Murchison 认为有必要在第二版提出如下的警示:“我们一直都未试图简化、浓缩或提出不成熟的思想。本卷是为特定的学者服务的,它要求具有强大的说服力。”(Murchison,1933,p. vii) Murchison 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因为第一版的销量未能像教科书那样畅销;也可能他受到了有关第一版在可接受性方面的消极评价。

Murchison 认为第二版与第一版极少有雷同,这有些夸大其辞。其实,大约有一半章节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只有很少的增加和更新。(尽管 Murchison 仍继续使用“阳刚”的措辞,但第二版的 24 位作者中仍有 10 位是女性。)有些第一版的作者被要求撤除原来的章节而改写新的主题。例如,Goodenough 撰写“心理测验”一章而非“儿童图画”的内容,Gesell 在其撰写的一章中简要阐述了他的成熟论——这超越了他以前的双生子研究。

但 Murchison 在第二版也做了一些较大的改变。他完全摒弃 Anna Freud 的观点,认为心理分析在心理学的学术界已遭到疏离。Leonard Carmichael 首次作为作者撰写了重要一章(它是迄今为止手册中最长的一章),内容是有关产前和围产期儿童的发展。Leonard Carmichael 日后在手册的传承中起到关键作用。第二版增添了三章生物学导向的内容:一章是关于新生儿动作行为,一章是关于生命最初 2 年内视觉—操作功能,另一章是关于生理“欲望”,例如饥饿、休息、性的内容。加之 Goodenough 与 Gesell 在其研究视角上的较大的转变,所有这些都使 1933 年的《手册》向生物学方向有了更多的扩展,这也与 Murchison 长久以来的愿望相一致:他希望这些新兴的领域使儿童心理学展现出作为硬科学(hard science)的骨架。

Leonard Carmichael 在主持 Wiley 出版的首版《手册》时任职 Tufts 大学校长。从大学出版社转到历史悠久的 John Wiley & Sons 商业公司,这与 Carmichael 众所周知的雄心是一致的;的确,Carmichael 的努力是想让这本书变得更有影响,使之超越 Murchison 当初的所有预期。此时书名(当时只有一卷)被改称为《儿童心理学指南》(*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这与 Carmichael 的如下意图相吻合:他希望出版一本“优秀的科学指南,以期在这一领域内的各种良好的基础教科书与学术的期刊文献之间,建起一座跨越两者的桥梁”(Carmichael, 1946, p. viii)。

这本《指南》在 1946 年出版,Carmichael 抱怨“这本书的诞生艰难,代价昂贵,尤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Carmichael, 1946, p. viii)。然而,为这项工程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指南》很快成为研究生训练和本领域内学术研究的“圣经”。只要研究人类发展,到处可以看到这本指南。8 年后,Carmichael 时任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主任,他在 1954 年出版的该指南第二版的前言中写道,“第一版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大受欢迎,这预示着对儿童成长和发展现象的研究越来越重要”(Carmichael, 1954, p. vii)。

Carmichael 主编的《指南》第二版的使用周期很长:直到 1970 年 Wiley 才推出其第三版。Carmichael 当时已经退休,但他仍对此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坚持下,他自己的名字仍成为第三版书名的一部分;几乎令人难以想象,它被称为《Carmichael 儿童心理学指南》,即使此时新任主编已经上任,作者和顾问也已更换新人。Paul Mussen 接任了主编一职,再次使这项工程展现辉煌。第三版变成了二卷本,它的内容覆盖了整个社会科学并被发展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广泛引用。很少有一本学术性的纲要文献会既在自己领域处于如此主导地位,又在相关学科也有如此高的知晓度。这套《指南》对研究生以及高级的学者同样是重要的资源。出版界更是将《Carmichael 指南》作为标准,以致其他出版的科学手册均与之比较。

1983年出版的第四版由 John Wiley & Sons 出版并被重新命名为《儿童心理学手册》。此时, Carmichael 已经去世。整套书扩展为四卷本, 学界多称之为“Mussen 手册”。

Carmichael 为新兴的领域所选的内容

Leonard Carmichael 当年应 Wiley 出版社之约成为主持这项出版工程的主编。工程获得了商业的资助, 并且版本予以扩展(1946 年与 1954 年指南)。关于从何处搜寻、选取他认为重要的内容, Carmichael 曾作如下说明:

作为既是《指南》的编辑又是特定章节的作者, 撰写者都受惠于……广泛接受并使用先前出版的《儿童心理学手册》(修订版)的材料。(1946, p. vii)

《儿童心理学手册》和《儿童心理学手册》(修订版)的编撰都是 Carl Murchison 博士。我希望在此表达我对 Murchison 博士在推出这些手册以及在其他心理学高级著作方面所做的先驱工作的深深感激之情。《指南》在其精神和内容的很多方面都归功于他的先见和编辑才华。(1954, p. viii)

上述第一段引自 Carmichael 1946 年版的前言, 第二段引自 1954 年版的前言。我们无从知晓缘何 Carmichael 直到 1954 年才表达了对 Carl Murchison 个人的赞辞。也许是粗心的打字员在 1946 年版的前言手稿中遗漏了称赞的段落, 而这一遗漏当时又未引起 Carmichael 的注意。或者也许经历了 8 年的成熟发展之后, Carmichael 平添了慷慨之情。(也可能 Murchison 或其家人对此有了抱怨。)不管怎样, Carmichael 终于对他的《指南》之基础予以承认了, 如果说这不是对它们的初始编辑所作承认的话。他的选择是从这些基础开始的, 这为我们披露了手册的部分历史。它为我们今天作为那些为 Murchison 及 Carmichael 所主编的手册作出贡献的先驱者们的后辈, 留下了巨大的智慧遗产。

尽管 Leonard Carmichael 在 1946 年版的《指南》中所采取的思路与 Murchison 1931 年版和 1933 年版的《手册》的思路大致相同, 但 Carmichael 又沿此思路向前有所发展, 他增加了某些部分, 也增添了他自己的色彩, 删除了部分 Murchison 所重视的内容。Carmichael 首先沿用 Murchison 的五章关于生物的或实验的主题, 例如生理成长、科学方法、心理测量等。他加入了生物学导向的新三章, 涉及婴儿期的发展、身体成长、动作和行为的成熟(Myrtal McGraw 的介绍立刻使同一卷中 Gesell 的那一章显得过时了)。随后他委托 Wayne Dennis 撰写了有关青少年发展的一章, 其主要关注点是青春期的生理变化。

关于社会及文化对发展影响的主题, Carmichael 保留了 Murchison 中的五章: 两章是由 Kurt Lewin 和 Harold Jones 撰写的有关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Dorothea McCarthy 撰写有关儿童语言的一章, Vernon Jones 撰写有关儿童道德的一章(现在题名“性格发展——一种客观的研究途径”), 以及 Margaret Mead 撰写的有关“早期幼稚”儿童的一章(由于采用了一些取自世界各地具有异国文化色彩的母子照片而提高了人们的兴趣)。Carmichael 同时保留了 Murchison 另外三章的主题(情绪发展、天才儿童、性别差异), 但他选择新作者来撰

写它们。但是, Carmichael 删除了 Piaget 和 Bühler 所撰写的二章。

Carmichael 的 1954 年的修订版是他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修订版,其结构和内容与 1946 年的《指南》非常接近。Carmichael 再次保留 Murchison 原版的核心,以及多名作者和章节的主题,有些同样的材料甚至可追溯到 1931 年版的《手册》。不足为奇,与 Carmichael 的个人兴趣最接近的章节得到了明显的保留。只要有可能, Carmichael 就会倾向于生物及生理学。他显然支持对心理过程的实验处理。然而,他还是保留由 Lewin、Mead、McCarthy、Terman、Harold Jone 和 Vernon Jones 等所撰写的有关社会、文化和心理分析的内容,他甚至还增添了由 Harold 与 Gladys Anderson 所撰写的有关社会发展和由 Arthur Jersild 所撰写的有关情绪发展的两章新内容。

Murchison 和 Carmichael 所主编的《指南》和《手册》至今仍是令人感兴趣的读物。这一领域内经久不衰的许多话题正源于那时:诸如先天—后天之争;普遍主义的一般性与情境主义的特殊性的对立;个体发生期间的改变是延续性的还是间断性的;成熟、学习、动作活动、知觉、认知、语言、情绪、行为、道德以及文化的标准范畴——都通过分析而得以区分,然而,正如每一卷的所有作者都承认的,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人类发展的动态整体之中。

以上这些如今并未改变,但早期版本中的很多内容难免显得有些陈旧了。那些描述儿童饮食偏好、睡眠模式、习惯消除、玩具和身体体型的大量篇幅,如今看来是有点奇怪而没有什么可圈点之处。有关儿童思维和语言的章节,其撰写年代是在现代神经科学以及大脑/行为研究带来的突破之前。有关社会和情绪发展的章节也忽视了社会的影响以及自我调节的内容,而这些方面很快就为后来的归因研究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其他一些研究所揭示。某些术语,如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网络、行为遗传学、社会认知、动力系统、积极的青年期发展等,在当时定然是不为人们所知的。甚至 Mead“幼稚”儿童的论述与当代文化心理学中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相比,也显得十分薄弱。

通观 Carmichael《手册》的各章,它们列举各种独特事实并有规范的倾向,很少用到什么理论将之联系起来。情况似乎是:人们沉浸在一个新领域的前沿有所发现的喜悦之中,所有这些新发现的事实在其被发现的过程中及其本身都是有趣的。当然,这就使得很多材料似乎给人以奇特和任意之感。我们很难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一事实系列,应把这些事实置于何处,哪些是值得追根溯源,哪些是可以放弃的。毫不奇怪,在 Carmichael 的《指南》中呈现的一堆材料以如今的标准衡量,它们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糟糕而没有什么关联的。

时至 1970 年,对理解人类发展而言,理论的重要性变得不言而喻。在回顾 Carmichael 的最后一版《指南》时,Paul Mussen 写道,“1954 年版的《指南》只有一章是关于理论的,它介绍了 Lewin 的理论,目前我们看到,这一理论对发展心理学并没有产生什么持久而重要的影响”(Mussen, 1970, p. x)。在随后间隔的多年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偏离标准的心理学研究的转向,这一度被认为是“荒漠之地(dust-bowl)经验主义”。

Mussen 的 1970 年版本——当时称为《Carmichael 指南》——已面目一新,几乎整体更新了它的内容。两卷中只有一章采自之前,即 Carmichael 自己新写的长文“行为的开始与